

桐城古文學派小史

魏际昌 著



桐城古文學派小史

魏際昌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魏际昌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875印张

194,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3

定价：1.85元

ISBN 7-5434-0225-4/Z·5



王孝子詩

至道不在遠
 齊行州
 既青
 嗟我王
 孝子
 子秋
 仰芳
 履
 奉為
 至
 北
 大
 生
 父
 自
 嬰
 災
 市
 子
 年
 漸
 歲
 後
 用
 答
 答
 以
 乃
 願
 妻
 子
 一
 笑
 亦
 遠
 以
 杯
 金
 子
 命
 以
 棄
 舍
 為
 惟
 逃
 死
 苦
 等
 門
 子
 身
 處
 危
 臨
 亡
 命
 長
 張
 倫
 亡
 食
 膏
 賜
 為
 多
 悔
 曾
 月
 思
 百
 業
 咸
 建
 新
 范
 日
 月
 逃
 行
 家
 國
 陰
 陽
 張
 數
 十
 萬
 死
 生
 可
 一
 田
 園
 心
 已
 灰
 誰
 亦
 孝
 子
 老
 已
 同
 妻
 而
 不
 此
 生
 遂
 乃
 遇
 于
 初
 去
 日
 雷
 離
 立
 抱
 時
 子
 多
 難
 多
 料
 長
 成
 長
 如
 孝
 子
 多
 為
 世
 主
 義
 者
 誰
 父
 說
 作
 不
 淺
 又
 誰
 誰
 進
 父
 志
 王
 已
 嗟
 乃
 敢
 取
 履
 履
 誓
 心
 事
 以
 不
 誓
 將
 以
 不
 悔
 務
 終
 代
 我
 孝
 心
 必
 死
 而
 母
 同
 持
 履
 呼
 孝
 月
 久
 已
 馳
 入
 烟
 浩
 公
 海
 物
 吉
 何
 施
 量
 量
 夜
 流
 隨
 風
 東
 西
 在
 孝
 舍
 令
 日
 晚
 依
 存
 已
 疑
 孝
 子
 再
 推
 起
 此
 願
 去
 不
 福
 據
 聲
 孝
 名
 佳
 古
 跡
 修
 遠
 雖
 險
 亦
 不
 聽
 此
 阻
 水
 調
 漂
 亦
 及
 四
 野
 國
 恩
 福
 九
 達
 面
 日
 既
 望
 黑
 多
 遠
 時
 祇
 可
 地
 當
 分
 為
 得
 取
 望
 地
 意
 誠
 發
 天
 地
 事
 苦
 勤
 神
 祇
 一
 夕
 北
 海
 出
 其
 有
 悅
 難
 窺
 只
 以
 善
 占
 驗
 云
 性
 南
 就
 之
 子
 昔
 在
 父
 相
 是
 至
 邵
 司
 果
 於
 如
 故
 權
 浸
 孝
 後
 津
 津
 神
 孝
 於
 曲
 折
 天
 幸
 修
 而
 能
 國
 外
 子
 門
 如
 子
 信
 情
 廉
 同
 其
 何
 若
 乃
 得
 尋
 親
 嗣
 又
 過
 備
 存
 舍
 折
 薪
 竹
 展
 炊
 開
 鄉
 邑
 同
 為
 向
 年
 生
 為
 大
 呼
 孝
 子
 名
 二
 名
 亦
 淚
 嘉
 如
 意
 出
 表
 為
 於
 桓
 得
 得
 漢
 居
 位
 其
 長
 相
 欠
 不
 在
 焉
 是
 乃
 孝
 父
 也
 否
 又
 父
 相
 持
 圖
 圓
 在
 再
 此
 舉
 宜
 同
 應
 一
 親
 年
 該
 大
 孝
 德
 愚
 仍
 依
 子
 不
 喜
 去
 孝
 天
 理
 宜
 有
 是
 也
 自
 代
 為
 為
 禍
 出
 在
 倫
 矣
 有
 親
 不
 能
 多
 膝
 下
 感
 奉
 孝
 願
 作
 孝
 子
 傳
 大
 書
 付
 雕
 刊
 聲
 以
 風
 俗
 之
 失
 一
 以
 詩

桐城蔡名世稿





方苞



刘大櫟



姚鼐



吴汝伦

前 言

笔者研究“桐城古文学派”，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可是直到现在才敢说是略窥门径。这主要原因是去年九月在安徽桐城参加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桐城派古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受到了启发。就是说，象三十年代初那种指斥“桐城派”为“谬种流传、选学妖孽”的看法，也即是全面否定它的错误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了。按“桐城派”的“道”，是“程、朱之后”的“儒家”。“桐城派”的“文”，是“韩、欧之间”的“古文”。这“程、朱”的“儒家”，是自南宋以来一贯推行的统治思想，但可不等于说，它在桐城作家的头脑里是纯而又纯一成不变的。清人以女真入主中国，这反对统治的“民族思想”就不断潜伏或露布在清初诸儒中。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不用说了，就是作为桐城前辈的方以智（明亡不仕，落发为僧，隐居梧州，反对宋、明道学的博物君子），休宁前辈的戴东原（精于考据、训诂，但不只是一位汉学家，通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作，又足证明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在人生态度、学术思想上，就影响了戴名世、方苞和姚鼐。

这“桐城派”的“韩、欧古文”，据我们看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的，因为，无论在“义法”的归纳上，创作的表现上，他们都是既继承又发展，成体系，有特色，因时变易，与前不同的。如“辞类”的大“编纂”，“文笔”的较清新、思想的讲解放、尤其是许多作者的不慕荣利、热心于科研和教学的行谊，是很值得称道的，而后期诸人的经世致用，高唱改革，开通风气，引入西学，也不能不说是“咸与维新”了。笔者的意图即是打

算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它的历史情况，重新给予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价，其方法则是“以人为纲（并不一定是‘列传’据事系（联找寻作者们的师承关系），排比先后（依其生卒年代而定），分清地区（影响所及的几个省份）的。使人按图索骥一目了然。

既曰“小史”，便不是“大观”，谓之“学派”亦与“文派”有别，如果能够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长而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古文学派，交待得清楚，总结了问题，则是笔者没有白白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了。

本书荷蒙书法家黄绮教授为之题签，艺术家柳青同志创作桐城主要作家肖像，胡葭缙先生提供了桐城三祖旧居及墓地的影片，统此致谢。

一九八六年 五一节后于 保定古城

序 目

第 一 编

桐城古文学派的树立 桐城“四祖”

第一章	先行者戴名世	(1)
第二章	创始者方苞	(20)
第三章	中继者刘大櫟	(45)
附	吴定	(45)
	王灼	(64)
第四章	集成者姚鼐	(67)

第 二 编

桐城古文学派的分播 姚门诸子

第一章	安徽桐城的作家	(95)
第一节	方东树	(95)
附	戴钧衡	(100)
	方宗诚	(104)
第二节	刘开	(106)
第三节	姚莹	(109)
第二章	江苏上元的作家	(113)
第一节	管同	(113)
第二节	梅曾亮	(118)
附	邵懿辰	(122)
	鲁一同	(124)
	冯志沂	(126)

第三节 姚椿	(128)
第四节 吴德旋	(131)
第三章 江西新城的“桐城派”作家	(137)
附 朱仕琇	(137)
罗有高	(137)
第一节 鲁九皋	(139)
第二节 陈用光	(141)
附 陈学受	(141)
陈 溥	(141)
吴嘉宾	(141)

第 三 编

桐城古文学派的分播 梅氏之群与“阳湖派”

第一章 湖南的“桐城派”作家	(149)
第一节 吴敏树	(150)
第二节 杨彝珍	(154)
第三节 孙鼎臣	(156)
第四节 郭崇焘	(158)
第五节 王先谦	(160)
第二章 广西的“桐城派”作家	(162)
第一节 吕璜	(163)
第二节 朱琦	(165)
第三节 王拯	(171)
第四节 龙启瑞	(174)
第三章 阳湖古文学派	(178)
第一节 恽敬	(179)
第二节 张惠言	(186)
第三节 李兆洛	(191)
第四节 陆继辂	(194)

第 四 编

桐城古文学派的陵替——“准桐城派”

第一章 私淑桐城的曾国藩·····	(199)
第二章 曾国藩的幕客·····	(205)
第一节 张裕钊·····	(206)
第二节 薛福成·····	(211)
第三节 黎庶昌·····	(216)
第四节 吴汝纶·····	(224)
附 严复·····	(229)
林纾·····	(235)
后 记·····	(246)

第 一 编

桐城古文学派的树立 桐城“四祖”

第一章 先行者戴名世

声应气求、物以类聚，志同道合，人以群分，这派系的活动是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历代有影响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过，有的偏于政治，有的重在学术，有的单讲文字创作，也有混合着说的，由于目的不同，于是称谓各异罢了。例如先秦诸子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被分为各家各派，主要是着眼于学术思想的。这从西汉的司马谈（？—前110），东汉的班固（约49—约120）已经有所论定了。而以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之集团，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之祸”（169—176），北宋哲宗时的“元祐党人”（1086—1093），明神宗万历年间的“东林党”（1593—1643），便只能叫作“党派”而非学派了。

这里的“桐城古文学派”是怎样得名的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它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单纯的文派。因为桐城的作者，不只讲求文章还要顾及学行，与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江西诗派”（北宋末年，以黄庭坚为首），以经学考证为主的“汉学家”（如东汉的马、郑、清初的顾、江、戴、段），以性理实践为主的“道学家”（宋代的廉、洛、关、闽。其重要代表，程、朱），俱不相同。他们是从“言有物、言有序”，发展到义理（思想）辞章（艺术）考据（科学方法）三者并重的古文之学。桐城是创始人们的家乡，

古文则对时文而言，他们也重行谊之故。

为什么要说戴名世是桐城古文学派的“先行者”呢？这是由于他：隶籍桐城，在康熙年间时文、古文、都极有名，而且是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前辈、好友。方苞所强调于古文中的义法、辞章许多方面是受了戴名世的影响的，甚至可以说是由他谆谆诱导、长期帮助始有成就，何况名世自己的职业是教书、卖文，南北著称，弟子门生也不在少，晚年又一甲及第当上编修了呢，要不是《南山集》案发，他作为桐城派的开创人物，那是毫无疑问、名符其实的。数典不能忘祖，我们应该尊重史实，认为“桐城古文学派”的得以树立、开拓、与延续、都脱离不开戴名世的先行之功。因为他的特殊贡献正在于改造时文振兴古文，高标义法揭示史法，为人之所不能为，自我牺牲，不是普通的文人作者。让我们先看看他的生平。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桐城人。生于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卒于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清史·文苑传》说他：“生而才辨隽逸。”靠着教学私塾生活。后来以制举文作得好，陆续考取了廪生、贡生、补为正蓝旗教习。授知县，未几弃去，往来于燕、赵（今河北省地），齐、鲁（今山东省地），河、洛（今河南省地），吴、越（今江苏、浙江两省）等地，卖文为业。他喜欢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制。达官贵人都怕他的利口刺激，多加忌恨。他尝大言于北京说：“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如果写将出来，定会与众不同”。康熙四十八年他业已五十七岁，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得授编修之官，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的门人龙云鹗、刻印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用明季永历年号，但也只是他好读《左传》、《史记》。有意自撰《明史》的一种“史法”，并没有什么“反满复明”的念头。他在《与余生书》中说：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踰时而又已灭亡，而史得以备书其事。

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为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今之海南岛），而其事渐以灭没。

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司马迁）、孟坚（班固）、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念焉。

余始者之志于“明史”有深痛，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以此为念者。（节录）

我们详看名世这篇文章，至多不过是绽露了缅怀前朝有志修史的思想感情。这种想法，明末清初的大知识分子如顾（绛）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人即曾普遍地存在着。因为它不止是改朝换代，而且是异族入主么。他们有的还高举义旗进行过反抗呢。但至康熙中年以后，三藩、台湾俱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基本上已经巩固，戴名世一个文人，还能闹出什么名堂？他不是既应了试还作了官吗？但，都御史赵申乔却劾奏名世是“悖逆”，是“大逆”。赵申乔的原疏道：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

事：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鬻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

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看来这不过是赵申乔在翻戴名世的老账：“恃才放荡、肆口游谈，”以及“私刻文集”，这些都是名世通籍登朝以前的事，而言之凿凿，耸动听闻致使申乔一奏成谏，遂逮名世下狱论罪，当是触犯了朝廷之大忌，所以非办不可的内在的原因。它是什么呢？它是因为，当时清人在军事上虽已统一了中国消除了叛逆，在政治上安排了官吏，定立了制度，可是在人心上还不曾内外一致上下协同，就是说满、汉之间，貌合神离，尔诈我虞。那末，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帝，鉴于怀柔、豢养、收买俱不奏效的时候，便不能不采取高压的手段，箝制人口的“文字狱”了。“身在曹营心在汉”，能够允许吗？还能有比不奉“正朔”，仍称“明季三王年号”更严重的罪名吗？这是“大逆”，不可饶恕！所以关了两年，反复研究的结果，终于“鞫实坐斩”了。赵申乔适逢其会，立了“头功”。（也不排除他的窥伺意图、率先发难之奸）。

当然，其它因素，如赵申乔的“挟嫌”，戴名世的“狂放”，与方孝标有“牵连”，等等。但至多不过是《南山集》案的“导火线”或“催化剂”而已。如同从康熙二十八年，清帝的多次南巡一样，劳民伤财骚动天下，何尝是为了“游山玩水”个人享受？“耀德观兵，示威深入”，才是他的政治目的。只要有利于皇权的稳

定、汉人的帖服，什么手段使不出来呢？惩一警百“杀鸡给猴看”，古今一理，中外不二。

康熙五十一年，刑部的最后裁决是：戴名世大逆，当身磔族夷。集中挂名的都判死罪。赖朝臣李光地（文渊阁大学士，笃信程、朱，功在献计平耿精忠，举施琅定台湾）等力救，方才改处名世大辟（斩首）。行刑之日，景象异常凄凉，名世的亲戚、家人，谁也不敢露面。只有他的老友杨千木，雇了一辆货车跟名世同到刑场。并说：“谁能认为上头一定派人监视，不准接触行将毕命的犯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理会”。到底捧着砍下来的名世的脑袋，纳入棺内，予以埋葬了”（《南山集集外文七杨千木墓志铭》）。

本来清人入关之初，大兵南下中原（以豫亲王多铎为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余悸犹在人心。不到五十年，京城的“白色恐怖”又传播起来。缙绅之士为了苟全性命，谁敢以身试法？连方苞等人都以编籍为奴得保首领为幸。所以象杨千木这样的人，对于戴名世居然敢陪临刑场死葬其尸，没有点儿义气敢于不顾生死的豪侠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那么对比起来赵申乔一类的奴才，岂不是差同天地，狗彘不食了吗？据说名世在狱中读书如故，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是好样的。“求仁得仁”与众不同，值得大书特书，不愧为“桐城派”的“先行者”。

清初的散文，在艺术手法思想境界上，是由明末“公安”的反对摹拟、信手信腕、流利清新、短小精悍发展下来的。如侯方域（朝宗）的才气奔放，敛气于骨，为“志传”能写生，深得迁固神理。魏禧（冰叔）的文主“识议”，凌厉雄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方以智语）。可以说是，过渡津梁于戴（名世）方（苞）之文的。特别是顾炎武的精深博大，汉、宋兼综，讲学而不堕于空疎，考古并不流入破碎，他的诗文也豪迈经世，俶诡可观。再加上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综贯经史、旁推百家，而学行相顾、亮节高风，这个头可真开得好。名世、方苞、同在江南，楼台近水，

岂有不濡染耳目先得皓月之理。所以，入关的清人虽粗犷，而江淮的儒士好承乏，康、乾之际遂焕乎其有文章了。

戴名世，虽有作者之名，亦时以卖文为生，但却反对泛滥吹捧风靡浮薄。他说：文章之陋已久，“妄庸相授，日日已甚”他说：

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谓名士，开口说书，执笔属文，天下之人皆其流辈。以故从而称之，虽语以是非之故，皆不省（《与何杞瞻》）。

以文谏之者，其文可知也。好人谏己之文者，其文亦可知也。古者赠人以言，必取其所不足而规之，委屈开导，务期其有成，此古人忠厚之道也。（《章泰占文稿序》）

名世说，这些都是小人，必须予以指斥。因此，他们说“好骂人”，其然岂其然哉？我不过是有些愤慨，措辞未免失当而已。

名世之文，古朴简洁，言之有物。长于论事，充溢情感，他的好友方苞评论是：“少时文，清雋朗畅，中岁少廉悍”。“自信为终不沈没”的（《书先君子家传后》）。名世的乡后辈，方诚之，则称之为“空灵超妙，往往出人意表”。给他整编文集的戴钧衡更誉之为“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人如飞花御风，莫窥行止”。看来从其艺术风格上看这“冥心独往、妙远不测”的神韵，恐怕是他的主要成就了。因为名世自己就说：

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
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

故一心注其思，万虑屏其杂，直以置其身于埃壙之

表。用其思于空旷之间，游其身于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为之言（《与刘言洁书》）。

那么，“世人之言”又是什么样的文章呢？名世继续说：“耳剽目窃，徒以调饰为工”的，“菁华烂熳之章，考据排纂之际，出其有惟恐不尽”的，这些等于夸饰，毫无含蓄的文字，才是俗不可耐枵然无有的。因为，名世认为：“文贵独知”；须是“变化自然，行所无事”机杼已出，信手拈来的始为上乘。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闭门造车，孤陋寡闻，就可以有此造诣。反而应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收视反听，融会贯通以后，始能有得。“今夫文章之道，未有不读书而能工者也”（并同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冲淡”之外，名世还有个“好言史法”。“多幽隐之疾，颓然自放。论古人成败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己”的情况。（《潜虚先生文集一：方灵皋稿序》）。这便又回到他的立诚有物、犀利慷慨的意境去了。先说名世的“史论”，以古例今、义愤绝叫之文，如《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其略曰：

今夫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报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也；其次，力不能报而报之，不克而死；最下则忘之，又最下则事之矣！

名世是最喜欢读《春秋》讲求重“史法”的，这事显而易见是在借题发挥有所寄托的。他不是在贬斥鲁庄未能为父桓复仇吗？他不是在肯定翟义讨莽，敬业讨武，身死犹荣吗？作者的结论就更犀利了。名世云：

呜呼！庄公之事，吾无论矣。后之臣子，有遭其国